



重庆出版社

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费孝通 九十新语

费孝通 著



重庆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费孝通 九十新语

费孝通 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孝通九十新语/费孝通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11

ISBN 7-5366-7406-6

I. 费... II. 费...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4372 号



费孝通九十新语 FEIXIAOTONG JIUSHI XINYU

费孝通 著

责任编辑 夏树人 曾海龙

特约编辑 马宝琛

封面设计 海 洋

技术设计 寇小平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21.5

字数 328 千 插页 4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7-5366-7406-6/I · 1291

定价:35.00 元

重庆出版社科学学术著作
出版基金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钱伟长

副主任委员：蒋树声 伍 杰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石孙	于光远	马 洪	王梓坤
卢 云	卢 强	白春礼	冯之浚
伍 杰	任继愈	刘 杲	刘东生
汝 信	李重庵	李振声	邱式邦
宋叔和	张梅颖	陈 竺	陈 颢
罗涵先	季羨林	周光召	郎景和
胡亚东	饶子和	钱伟长	徐崇温
黄长著	蒋树声	程理嘉	瞿林东

逝世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卢鸣谷 刘大年 张致一 费孝通

内 容 简 介

“九十新语”，是费孝通先生 90 岁以后给自己定下的。努力攀登一个新高度写出有新意的、在学术上有分量和总结性的东西来是先生的意愿。

本书汇集了费孝通先生 90 岁至逝世前这 5 年里所写的重要文章。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所思所想。在《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等多篇文章中，都记录了先生对中华民族应该如何同世界各国人民和谐相处的深入思考；特别是在经济进入全球化，多元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不可避免的今天，人类该怎样取得持续发展的机会等问题，先生都有自己不凡的独见。《补课札记》、《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等多篇文章，则是先生在学术上的总结，从中可以感受到先生愈到晚年思想愈显示出的睿智与深刻。

悼 孝 通 兄（代序）

钱伟长

近些时间，我因常住上海，很久未能与老友孝通兄谋面了，只是知道他一直病重住院，牵挂和担心一直萦绕于胸。4月23日我公出至浙江，25日从临安回杭州途中，传来孝通兄不幸于24日夜在北京病逝之噩耗，不胜扼腕痛惜，怆然泪下。泪眼中，我仿佛又见孝通兄往日风采。

孝通兄早年即负笈英国，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以“江村经济”研究一鸣惊人，享誉海内外。回国后更是以强国富民为己任，行行重行行，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身影出现在大城小镇。孝通兄提出过许多有益于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良策，尤其苏南乡镇经济模式之研究为世人敬仰。孝通兄辛勤耕耘一甲子，著作等身，奖掖后学，滋兰树蕙，终成社会学教育和研究之一代宗师。孝通兄一生，体现出一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满腔报国情怀。

孝通兄和我曾长期在清华共事，后又同在民盟积极参政议政，共求国是，谋报效祖国之路。我调上海大学后，孝通兄更是鼎力相助，使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水平不断提升，跻身一流。孝通兄与我既是吴地同乡，又是同事，交往几十年，私交甚笃。我们曾无数次执手相聚，纵论天下，畅游学海。前年在上海见面时之情景犹历历在目，而今想起那面竟成诀别。此景真是恍如隔世，悲痛不已。

谨书此短文以表我对孝通兄沉痛悼念之情。为弟惟率全校后学同仁，致力于“科教兴国”，矢志报国为民，以继承孝通兄遗志。

2005年4月26日



悼孝通兄(代序)	钱伟长
补课札记	(1)
要对时代变化做出积极有效的反应	(81)
关于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一些思考	(86)
关于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再思考	(91)
论西部开发中的文化产业	(97)
新世纪 新问题 新挑战	(104)
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114)
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	(125)
关于“多元化的西部文化”和“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谈话	(136)
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	(150)
再谈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	(153)
人类学与 21 世纪	(158)
进入 21 世纪时的回顾和前瞻	(169)
对上海社区建设的一点思考	(180)
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	(189)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回顾与前瞻	(198)
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	(207)
家乡小城镇大发展的 20 年	(215)
发展如蜕变,说城镇与区域经济	(234)
“非典”的社会学反思	(250)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254)
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	(276)
暮年漫谈	(290)
“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	(314)
编后记	夏树人(327)

补课札记

——重温派克社会学

决心补课

1998年6月,我们趁北大100周年的东风,从国外和港台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界邀请一批当前比较活跃的学者,有些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多是较年轻的新进,莅校讲学,形成一系列学术演讲。我们的目的是想为我们的学科打开一些窗户,建立一些流通渠道,放进一些新鲜空气。在这系列演讲结束后,接着就开办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想趁热打铁,让这学科的东西两头接上。在研讨班结束时,我做了一次即席发言,发挥了一通我在这一段时间里常在头脑里打转的“补课”两字。

“补课”两字是小平同志1979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里提出来的。他是针对那些在大学里停止了有20多年的社会学等学科而说的。“需要赶快补课”这句话,成了后来重建社会学的根据。他所说的“补课”是指这些学科应当在大学课程里“补足”,也就是恢复的意思。后来我们觉得说恢复还不如说“重建”为更妥当些,因为如果社会学按20多年前的老样再端出来,似乎不太合适,还是根据当前形势的需要“重建”为好。

最近这段时间里在我脑子里转动的“补课”却是针对我个人而言的。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在学术上需要好好地补补课。特别是在听了北大100周年期间国外学者那系列演讲之后,更觉得自己有此需要。分析一下我这种自觉的迫切心情,看来是由于这几年来,特别是这一年来,我日益觉得所处的时代变动得太和太快了。在我参与这次系列演讲时已有所流露。我在这系列演讲里宣读的那篇《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里曾说,一个学者的理论总是反映他所处时代的实际。时代在变动,一个学者的理论也总是跟着在变动。我用这个观



点去说明马老师怎么会提出文化动态论的原因。我一面写这篇“书后”，一面反问自己，我跟上时代没有？这一问，使自己惊醒了。

我已说过多次，“身逢盛世”。时代是对得起我的，但我却有点负了时代，我自认自己远远没有赶上时代动态的步伐。我所处的这个盛世已为我提出了多少有意义的题目，但大多我却让它们在手边滑过去了，至多也只能说掠得一点影子。人为什么总是抓不住，吃不透？关键还是在自己能力不足。能力不足是由于自己这一生里投下的工夫不够。这方面我有自知之明，总结一句是求知之心还不够迫切和踏实，常满足于浅尝而止，难逃不深不透。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悔恨也没有用。眼睛还是看前面为好。尽管自知在我前面的日子已不会太多，但不管以后的日子还有多少，当前我的脑子似乎还抵用，于是自己提出了“决心补课”。

既有了这决心，我就得抓紧落实。首先要解决的是先补哪一课。我给自己的答复是先补社会学。老实说对社会学我一直有点头痛。这话可以从1979年乔木同志要我带头来重建社会学那一刻说起。当时我明确地表示我不敢接受这个任务。后来我还是勉为其难，即当时所谓“知难而进”。这段经过我已公开讲过不只一次了，这里不用多说了。

经过了20年，事实已证明：一个学科挥之即去是做得到的，要呼之即来却不那么容易。至今这门名叫社会学的学科，在中国还是不能说已经站稳。其他原因可以不多说，只说我自己。我扪心自问，应当承认这件重建社会学的事，我并没有做好，没有有始有终地完成。既然如此，接着，我觉得应当认真地想一下，在我生命结束之前，我还能做些什么？自己得到的结论，我应当做的，就是“决心补课”。这里所说的“补课”是重新补一补社会学的基础课。

补习社会学又怎样着手呢？我想只有老老实实地把我最初接触社会学时的课本端出来重新复习一遍。于是我回想到了我怎样开始学社会学的这段经历。我发现了一段缺课，没有学社会学的入门课。我是1930年从东吴大学医预科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转学时我已是三大的学生，到了燕京入了社会学系可说是半路出家，并没有学过社会学概论，这是大一的课程。因之我对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并没有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过。这使我吃了不是科班出身之苦。我进入燕京后所



修第一门社会学的课程是吴文藻先生讲授的《西方社会思想史》。在这门课程里当然也牵涉了不少关于社会的基本概念,但是这些都是我自修自学得来的,不系统、不结实。也许这是我在这个学术领域里一直成为一匹野马的历史根源之一。

我既看到了我自身有这一段缺课,觉得要补课就可以从这里补起了。于是我从书架上找到了吴文藻先生遗留下来给我的那本曾经在我进大学时的30年代在美国风行过一时的派克(Robert E. Park)和伯吉斯(E. W. Burgess)合编的《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引论》(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以下简称《引论》),我就把这本《引论》看做是我补课的入口门径。

关于这本《引论》我要加一段回忆。我现在手边用做补课入门的这本书,首页角上还有吴文藻先生亲笔的签名,下面还注明1927年2月5日的日期。这是件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事,我愿意在这里多说几句。吴文藻先生是1985年去世的。去世前曾向他的家人说,他遗留的藏书都要捐赠给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但是愿意留下一些给我这个学生作为纪念,至于留下哪些可由我本人去挑选。我重视这个遗嘱,因为这正是他一生“开风气,育人才”的生动实例。后来我从他的遗书中挑了派克老师所著的两本书:一本就是上引的《引论》,另一本书是《论城市》(The City)。当时我选这两本书,是因为吴文藻和派克这两位老师是我一生从事社会学的学术源头,留此实物作为纪念,永志不忘。没有预料到今天这两本书竟是吴老师为我留下当前“补课”的入门书。把以上这些事情联串到一起来,说是巧合似乎还不能尽意,如果说这里还有点天意,又未免太神了些。

派克来华

在我的学术生命里,“派克来华”原来也是一件偶然的巧遇,并不是我早就预料到的。但回想起来,这却是一件对我的一生起着关键作用的事。在这篇补课札记中,应该提前交代一笔。

派克来华是1932年。他当时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邀请来的访问教授。这并不是他初次到中国来访问。早



在1925年,美国参加太平洋学会这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时,派克就是这个团体的一个成员,并出席了该会在该年举行的檀香山会议。会后,他做了一次东亚旅行,到了东京、上海、南京和马尼拉,但没有到北京。1929年3月他又出席了该会在日本京都举行的会议。会后接着去印尼的万隆参加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会后,除在印尼各地旅游外,又到新加坡和菲律宾转了一圈。9月到达上海,在沪江大学讲了一课。10月到南京转去东京。这次东亚旅行他又没有到北京。

派克通过太平洋学会和东亚各国学者的接触使他对这些地区的民族和文化问题发生了深厚的兴趣,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在他没有到北京来之前就说过“不住上20年,谈不上写关于中国的书”。1932年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他从檀香山启程来中国,在日本小住了一下,直奔北平燕京大学。他心中有一个远大的计划,想联合太平洋各国的学者,共同研究“race problem”,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太平洋各国的民族和文化的接触、冲突和融合问题。他打算接受燕京大学的邀请,在中国讲学一个季度,然后去印度和非洲旅行。

1932年的秋季,我正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上学,是该年毕业班的学生。按我1930年转学燕京时的计划,1932年暑季应当就可以毕业了,但是因为这年正值日本侵占我们东北,全国各地发生了学生抗议示威运动。我在该年开学后不久因为参加游行队伍,在还没有习惯的北方深秋气候里受寒病倒,转成肺炎,送协和医院医治,住院有一个多月。学期结束时,大学注册科通知我,因请假超过了规定时间,这学期所修的学分全部作废,虽则各课期终考试都得了优秀成绩。但是既有校章规定,我只能在大学里多读一年了。本应四年毕业的大学教育,我却花了五年。回想这件事,也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因为如果我1932年暑假就毕业得了个学士学位,未必再留在燕京,那就不一定会有认得派克教授的机会了,我这一生就会有另外一番经历。

我是1932年暑假后,秋季开学时见到这位派克老师的,当时他的正式头衔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1933年他从这次亚洲旅行回芝加哥大学后就从这个教授岗位上退休了。到了1936年又不甘休闲进了美国Fisk大学去当访问教授,继续教书。Fisk大学是美国著名的黑人大学。

派克到燕京来讲学是认真的,意思是说,他正式开课,给学分,按时



上堂讲课。课后还通过个别谈话和偕同出去参观指导学生学习。我当时作为社会学系里高年级的老学生,正式选了派克的课,注了册,每堂去听课,还要按老师的指定,进行课外作业,作为一门正式课程学习。这一套规矩,现在大学里似乎已没有这样严格了。

在派克老师班上,我们这些学生特别认真,原因是他名气大,所谓先声夺人。在他未到之前,学生里已经流传开了他是美国社会学家,这门学科的老祖宗,即祖师爷,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他当时其实只有68岁,但满头白发,一看了就会觉得是个德高望重的学术泰斗。当时在燕京教社会学的老师,在我们的眼中都比他年轻,被看成低了一辈。所以我们提起派克总是要伸一下大拇指,所以说我在我们没有见他时,就已经心服了。他说的话得好好地听,相信一定是有道理的。一见面就觉得这位老师真是名不虚传。第一堂,就轰动了我们这辈年轻小伙子。我的同学杨庆堃,当时就记下了一笔这段话,后来在罗森布什(Raushenbush)写的派克传记里第133页上还被引用过。这段被引用的话当时在我们这些学生里是流传过的,翻译过来是这样:他开了一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的课,这确是这一批学生中在大学里最令人兴奋的课程。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在课堂上第一句话是:“在这门课程里我不是来教你们怎样念书,而是要教你们怎样写书。”这句话打动我们的想象力,开了我们的心窍。

那本传记里又说过,派克老师一直反对早年在美国乡镇小学里通行的所谓 Rot 教育,即死记硬背的教育法。他也许已风闻东方的教育基本上还是这一套,所以在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开始就表示反对这种学习方法。这句话特别打中当时我们这些学生的心,就是不要读死书和不要死读书。这几个死字,就把我们吸住了。接下去他说我们应当从生活的具体事实中去取得我们对社会的知识。他又用具体例子说明从具体生活中看到的生动事实要经过分析和归类,进一步去理解其意义。他鼓励大家要大胆提出假设,然后再用观察到的生活事实来肯定或否定这些假设。

我们听了派克老师开门见山的第一堂课,觉得大有道理和正中下怀,具有闻所未闻的新鲜感。其实这种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我们在五四运动时早已由胡适等人传入了中国。而且说起来也很有意思,胡适和派克所讲的这套话,原是出于同一来源,这来源就是美国在20世



纪20年代就很出名的“杜威博士”(John Dewey)。派克1883年在Michigan大学读书时就师从过杜威,而且一向承认深受他的影响,这是后话。胡适的那一套也是在美国留学时从杜威这位老师那里学来的。他所主张的实证主义在五四运动中传播到了中国。我们这批大学生应当早就听过这些“科学方法论”,但不幸的是这种其实已是“老生常谈”的话,我们在从派克老师口上听到时还是那样激动。这说明这套话并没有进入我们这批学生的头脑里,被读死书、死读书的传统卡住了。派克老师把这个障碍给踢开了,把我们的脑门打开了,老话变新变活了,这一变就把我们这批学生带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以我个人来说,不能不承认这句话为我这一生的学术经历开出了一条新路子。不仅我这一个人,凡是和我一起听派克老师这门课程的同学,多多少少在灵魂上震动了一下,而且这一震动,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其后几十年里的学术生活,说不定多少也影响了中国社会学前进的道路。我的这种看法和想法也说明了为什么我想补课时,又找到这位派克老师。

派克的早年

关于派克的身世,我所根据的资料主要是来自罗森布什所著的Robert E. Park: Biography of a Sociologist(《派克:一个社会学家的传记》,以下简称《传记》)。1979年,Duke University Press出版。关于这本书我又有一段话要在这里先说一下。

我并不认识这书的作者,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但由于这本《传记》有一篇导言和一篇收场白是派克第一代及门弟子休斯先生(Everett C. Hughes)所写,因而推想《传记》的作者大概也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出身的人。

我手头这本《传记》是1979年4月30日Hughes先生亲手送给我的。当时我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访美代表团到达哈佛大学。有人告诉我Hughes先生就住在附近,带了个口信来希望能和我见见面。4月30日我就找到Hughes先生的家,登门拜访。我们是初次见面,但久已是慕名之交。当时我们谈了不少有关派克生前的事,相见甚欢。临别他送了我这本当时新出版的《传记》。他还在该书扉页上当场写下:



“From his Chicago friends, the Redfields + the Hughes.”下面还写了日期和地点。这本《传记》随着我回到北京，一直搁在书架上，到我这次决心补课，重新复习派克社会学时，才开始认真地从头拜读了几遍。

我一向认为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反映这个人所处的时代，其内容摆脱不了他个人身世的烙印。所以要理解一个人的思想决不能离开这个人一生的经历。从一个人所有的思想，也可以看到这个人所处时代的面貌。从这个角度去重温派克社会学和 Hughes 先生送给我的这本《传记》实在太重要了。尤其是这本《传记》如他在导言里所说的是一本美国社会学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中的一部分。“自然史”是派克提倡的一种叙述事物在时间进程中的变化经历的体裁，叙述事物的对象可以是生物的一个种类，也可以是构成社会的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这本以自然史体裁写的派克传记也是一本叙述派克怎样成为一个社会学家经过的实录。这本《传记》固然是以派克一生的经历为主线，但从这个主线上也写出美国社会学怎样通过派克的一生的具体思想、活动而得到发展的这一段经过。这段经过不仅显示了美国在这一段时间里的社会变迁怎样影响派克这个人的思想和活动，还显示了这个人的思想和活动又怎样构成了美国社会变迁的一部分。社会变迁在个人身上的反映和个人对社会变迁所起的作用，这是双向性的，相互影响的。个人和社会合而为一，也就是派克这个人和社会学结合的结合。因之，对我这个想要温习派克社会学的人这是一本最切题的参考书。这本书在我的书架上沉睡了近 20 年后，这次补课才开始使 Hughes 先生的盛情进入了我的学术生命，切入我的头脑，不能不使我觉得像是一份天赐的助力。

派克老师出生于 1864 年，卒于 1944 年，享年 80 岁。他是欧洲移民之后，祖先姓 Parke，于 1630 年来自英国 Wetherfield，像很多英国来的移民那样，首先在美洲西岸的新英伦落脚。在其后的 100 多年内不知哪一代把姓尾 e 字给丢掉成为 Park。他的父亲 Hiram Park 原住美国中部 Pennsylvania 州，南北战争中他参了军，在北方部队里当一名尉级军官，1863 年退伍结婚。翌年 Robert Park 出生于美国中部 Pennsylvania 州的 Luzerne 乡的外婆家里。这时他父母的家是定居在 Minnesota 州的 Red Wing，一个位于密西西比河上的由新英伦来的移民于 1850 年建立的小镇上。这个小镇后来聚集了许多从北欧的瑞典和挪威来的

移民,成为这一片大草原上的一个粮食集散中心。他父亲在这个镇上开了一个小杂货店。

这时美国中部还处于开发初期,教育没有普及,Red Wing 镇上在 1874 年才开办小学,所以派克入学时已经 10 岁了。他的早年生活有点像马克·吐温笔下所描写的密西西比河上的流浪儿。他是在北欧移民的儿童中长大的。

《传记》这段叙述中说明派克的童年是在美国建国初期,南北刚刚统一,欧洲产业革命主要影响还限于美洲东海岸诸州,而正在逐步向中部拓张,抵达密西西比河流域。看来派克早年还是在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乡土社会里长大的,所以他一生的 80 年正是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由东向西开拓的这一个经济文化发展时期,也是这片美洲大陆由地方性的区域向全球化发展的开创阶段。

派克 1880 年小学毕业,成绩不佳,在有 13 个学生的班级上名列第 10 名。他父亲很失望,认为这个孩子不堪造就,所以不准备让他升学。但是好胜倔强的性格使他愤而离家,靠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于 1882 年进入了 Minnesota 大学。过了一年他父亲才回心转意,支持他进 Michigan 大学。在 Michigan 大学里他除了学习古代和当时流行的欧洲语文外,哲学是他所选读的主科。他醉心于歌德的《浮士德》。大学二年级时在老师中见到了我在上节里提到的当时在美国已很出名的杜威博士。这位老师使他改变了一生的志趣,从想当工程师转变到了要成为能理解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学者。就在他大学毕业的那年,杜威发表了四篇有名的心理学文章,后集成一书。这本书引导派克在 11 年后进哈佛大学时决心从事研究社会心理学。但是他曾说过,他从杜威这个老师那里学得的不仅是那门学科的知识,而是对知识的追求和对未知的探索精神。他和杜威在性格上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人类知识领域里的探险家。

1887 年派克老师毕业于密歇根大学,时年 23 岁,《传记》的作者列举了他当年突出的才能:广阔和持久的记忆力、通顺和流畅的写作力;而且在工作上他表现出耐苦和坚忍的性格,在待人处世上他显得易于接近人和善于理解人,特别是有洞察人情世故的兴趣。这些是他从早期家庭和学校中培养出来的高人一等的特点,为他走上当时新兴的美国社会学的路子做好了最初的准备。



人生道路的选择

按当时美国社会的习俗,一个人到了大学毕业就该成家立业了,就是要在人生道路上作出一个选择,进入一个职业。如果派克如普通人一般跟着父母走,他父亲开着一个杂货店,可以参与经商,或是像他已经去世的母亲那样,到当地学校里去教书,当个教员。他对这两条路都不感兴趣。因为他在大学里受了老师杜威的影响,认为一生最有意思的事业是不抱任何实用的目的去观察和理解这个世界,特别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最企慕的是像歌德所写的浮士德那样能阅尽人间哀乐。他抱着这种志愿在 Minneapolis 的报馆里找到一个记者的职位。他认为通过采访新闻就可以接触到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物,对各种人物的不同生活进行观察和理解。

这时正当 19 世纪的 80 年代的后期,美国中部各州经济正处在急速发展中,工业的兴起带来了城市化。各州都产生了作为地方经济发展中心的中等城市。十几万或几十万人口的城市里都有它的地方报纸。派克从 1887 年 23 岁起,一直在这些地方报馆里工作,从 Minneapolis、Detroit 到 Denver 当了四年的记者。到 1891 年他才以记者身份进入美国当时最大的城市——纽约。他后来曾回忆起当初进入这大都会时的印象,怎样被人如潮涌的百老汇大道和 Brooklyn 渡口的那种巨大人群的集体力量所倾倒,甚至可以说着了迷。

派克在他年华正茂的时刻,挑选了新闻记者这个职业,这个职业把派克这个思想领域里的探险家送进了五光十色的城市。派克这段身世正好为我们一向所说的“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个辩证的命题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从时势这一头说,美国这个社会经过 100 多年的历史,在 19 世纪 80 年代已经到了羽毛渐丰,正要展翅起飞的时刻。成为经济中心的大小城市,在这片曾一度被称为新大陆的土地上,一点一点地兴起。从世界四面八方移入的人群怎样适应这个时代聚居在一地的要求,互相合作来创造一个新的繁荣局面,正需要一个自觉的意识和自主的行动方向。这个时势呼唤着在西方文明酝酿已久接近成熟的科学思想中产生一门社会学。可是要使这种知识能成为一门科学,还



需要一批人才用系统的思想来表述。这种历史的需要形成了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就是所谓时势。在事后看来,这种时势似有意识地正在无数待位生中挑选名角。从这个角度去看派克之成为“一个社会学家”似乎是时势所塑造的。把这段实际史实的经过写出来不就成为“一个社会学家”的自然史了么?

时势造英雄是“事后诸葛亮”的立论。在实际历史过程中,时势包含着无数既独立又综合的因素,现在还不是人力所能分析和计算的客观存在。所以一般还只能用“看不见的手”、“天意”或“鸿蒙”等话语来表述。在“英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自觉的,因而这种还是不很自觉的主观心理活动至多只能用“志向”、“意愿”、“兴趣”、“倾向”等不很明确的概念来表达。

以上所说的时势和英雄的合一其实也就是个人和社会的合一,或是主观和客观的合一,也可能就是传统所谓天人合一。只说“合一”还是太笼统了些。合一的过程值得分析一下。以派克做实例,他之成为一个社会学家固然可以说是符合时代的要求,但是他之所以符合这要求而入选,则有他个人的主观因素。以他好动和不甘心走老路的性格来说,可以认为是他早年作为一个“密西西比河上的顽童”的生活所养成的。这段生活又是和他父母们定居、择业和给他幼年的教育有关。而且如果他长大了不转学到密歇根大学去念哲学,他不一定能受到杜威的影响和浮士德的启发,他就不一定会拒绝在家乡学校被聘为教师,而选择记者这个职业。人生每一个环节都受到个人经历的诱导和制约。从每个环节上看,主客双方的因素都在起作用,一方面可说都存在着机遇,另一方面看又似乎都是定命的。所谓机遇又可以看成是客观的安排,所谓定命也未始不是自作自为地自投网罗的个人行为。如果我们对每个人每个活动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分析,就不难看到这些无一不是综合复杂的混合体。从主观上说,派克之成为一个社会学家就是因为他有一个观察和分析思想领域的探索精神。

派克固然是选择了当记者这个职业,但是他却并不甘心做个当时社会所常见的记者,或是说做一个为当时报馆所要求那样循规蹈矩的记者,按照编辑的要求提供采访的报道。编辑当然要按读者的胃口来编排每天发排的新闻稿,如果所发的稿子不合当时读者的口味,就会影响这个报纸的销路。报馆、报纸的发行、编辑和记者都不过是当时现实